

刘正强 著

鲁迅思想及创作散论

南开大学出版社



87
I210.97
225
3

鲁迅思想及创作散论

刘 正 强

BH101/25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6.10

B 385630



鲁迅思想及创作散论

刘正强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内)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大港报刊印刷厂印刷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375插页

字数: 160千 印数: 3,000

统一书号: 10301·26 定价: 1.15元

目 录

鲁迅思想发展探讨	(1)
论鲁迅的人性观和人道观	
——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	(19)
鲁迅论美四题	(36)
鲁迅和茅盾的现实主义文论	(54)
论鲁迅小说的启蒙思想和创作特点	(76)
博采众长 自成一家	
——论鲁迅小说中的借鉴、继承和创新	(98)
《呐喊》、《彷徨》的悲剧特色	(112)
论《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	(124)
《阿Q正传》的认识意义	(145)
《祝福》论析	(162)
《伤逝》的爱情悲剧探源	(175)
鲁迅杂文的审美特性	(186)
“象征主义说”质疑	
——《野草》创作方法辨	(204)
鲁迅诗歌风格浅探	(217)

鲁迅思想发展探讨

近年来,关于鲁迅前期思想及其发展的研究,已成为鲁迅研究中的“热门”题。如何概括鲁迅思想发展的线路?鲁迅思想什么时候发生质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些问题不容置疑,是应该认真研究的。但是,研究的重点如果仅仅局限于用一个单一的概念来概括鲁迅的全部思想,局限于研究鲁迅的哪些文章表现了什么思想,哪些文章如何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何年何月标志着他的思想质变,而对鲁迅前后期思想的一贯性,它的独特贡献缺乏深入的探索,显然是不够的。

鲁迅始终是立足于改变中国社会现实的伟大思想家,他对中国社会历史有非常深刻的观察和非常精辟的分析,他的前后思想虽然有性质的不同,但却是前后贯穿的整体,即使他后期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也决不是割断和抛弃了前期的思想,简单地重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而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提炼自己的前期思想,总结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深刻揭露中国社会的矛盾。因此,研究鲁迅的思想,应该着重研究他前后期思想的特点和连贯性,而不应停止于单纯论证他前期思想的局限、某年某月完成世界观的转变等等,更不应该把鲁迅前后期思想截然对立起来。

一、如何概括鲁迅的思想

过去概括鲁迅的思想,最流行也是最权威的说法是“从

进化论走向阶级论”。近年来,有的同志仍然沿袭这种观点,并且认定进化论不只是鲁迅早期思想的一部分或一个方面,而且是鲁迅早期思想的核心,是决定鲁迅早期思想的根本性质的。这种说法究竟符合不符合实际呢?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思想都包括许多方面,例如哲学思想、社会思想、政治思想、伦理道德思想、文艺思想、教育思想……等等,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概念来概括(实际上也不可能有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即便是某一方面的思想,往往也是错综复杂的。比如说哲学思想就有唯心唯物之分,同是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又有朴素唯物论、机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之别;同是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又有主观唯心论、客观唯心论;从认识论来看,唯心论可能具有辩证法,唯物论有可能是形而上学的;具体到某个人来说,在自然观上是唯物的,社会观上又可能是唯心的,情况就是如此复杂,所以,不作具体分析,简单地用进化论来概括鲁迅的前期思想,这是不科学的,同时也不符合鲁迅的实际。

毫无疑问,鲁迅前期接受过进化论思想,但进化论是他思想的全部呢,还是某一部分?在看法上是有分歧的,很多研究者对此都作了详尽的论析。进化论不能概括鲁迅前期的全部思想,基本上已为多数人所接受,但对于进化论在鲁迅前期思想中的作用和地位,是鲁迅的自然观还是社会观,看法还不尽相同。我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进化论本身是一种自然科学而不是社会科学,也就是说进化论属于一种自然史观而不属于社会史观,它是一种生物进化的观点,根本不能概括一个人的社会思想、政治思想、伦理道德思想、美学

思想等等。用进化论来说明一个人的思想体系在逻辑上显然是不周延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它的功绩是科学地揭示了生物起源的客观规律，为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提供了最新的科学根据，对上帝造人的邪说和静止地看问题的方法是一个彻底的否定，鲁迅从赫胥黎的著作中接受了进化论也正是指自然科学方面的唯物主义思想和事物不断发展变化的辩证观点。他的《人之历史》一文便是这样阐述生物界和人类发展的历程的。

进化论也确曾被引申到社会领域，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庸俗进化论，前者把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物竞天择”的法则引向人类社会，成为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理论根据；后者只承认自然界的发展变化，只有量的增加，没有质的飞跃，用来与唯物辩证法相对抗。如果说鲁迅在社会思想上也是一个进化论者，那么，他究竟属于哪一种进化论呢？

从鲁迅前期的一些文章来看，有的确有进化发展的观点（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例如《中国地质略论》以发展观点阐述了自然史，其中也用了“进化”一词，但并不就是生物进化论，只不过包含发展变化的意思而已。这篇文章主要表现的是爱国主义思想。《人之历史》可以算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详细地介绍了进化论学说的渊源，纯属自然科学范围。《科学史教篇》论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演变，说明科学技术在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的作用，表述了“科学救国”的思想，与生物进化论无关。《文化偏至论》则包含更多的启蒙主义思想，旨在谋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与进化论也没有关系。《摩罗诗力说》是著名的文艺论文，启蒙主义的美学思想十分明显，它们和进化论也毫不相干。《破恶声论》甚至还批判

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他痛斥那些“孤尊自国，蔑视异方，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的人是“兽性爱国之士”，并坚决反对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原则。至于庸俗进化论思想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改良主义，主张和平渐进，鲁迅对此也是有批判的，他说：“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其强谓之平和者，不过战事方已或未始之时，外状若宁，暗流仍伏，时劫一会，动作始矣”。“人类既出而后，无时无物，不稟杀机”。又如许多史学家谈到社会发展时说，专制之后是立宪，然后是共和，认为这是社会进化的规律，而鲁迅却以为历史证明，专制极严酷的时候“一血刃而革命成功”的例子很多很多。他坚信人类的进化要通过革命斗争，甚至流血牺牲，这是社会革命论的思想，和庸俗进化论有什么关系呢？

进化论固然是鲁迅前期的重要思想，但却不能说是他的全部思想。除了以上所举的事例之外，更重要的是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他所接受的思想影响是多元的，既有西方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又有我国传统文化中民主性的精华。这些影响以及鲁迅在战斗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思想理论，构成了鲁迅前期丰富的思想体系。用进化论来限制鲁迅的思想显然是不恰当的。

另一种意见不赞成用进化论来概括鲁迅前期的思想，主张用革命民主主义来概括。这种看法也值得商榷。

鲁迅前期在政治上确乎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但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毕竟不等于他的思想。所谓革命民主主义者并不是一个思想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列宁说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是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者，他同时还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主要是指车尔尼雪夫斯基善于用革命的精神去影

响那个时代的全部政治事件，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宣传推翻一切旧权力的群众斗争的思想。我们说鲁迅前期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也是从这种意义上说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只能产生在封建势力特别雄厚的国家，俄国和中国基本相同。因此，革命民主主义者主要是指站在广大被压迫的农民的立场上去反对封建主义，它的特点是反封建的彻底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民主主义者和一般的民主主义者的确有所不同，后者往往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其反封建往往带有很大的妥协性。鲁迅前期显然是高出于一般民主主义者的。但是一个人的阶级立场、政治倾向和他的世界观并不是一回事，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哲学观点可能是唯物的，也可能是唯心的，在认识论上可能符合辩证法，也可能是形而上学的；他所用来反封建的思想武器也是多种多样的。革命民主主义这个概念怎么能包括一个人的全部思想体系呢？

进化论和革命民主主义都不足以概括鲁迅的前期思想，如果一定要勉强给予概括，总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弊。大体说来只能从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相结合来概括。

一个人的世界观，如果从哲学的基本观点来区分，那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如果从认识论来区分，那就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如果从阶级属性来区分，那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但这三者的关系又是错综复杂的。唯物主义者不一定掌握辩证法，也不一定属于无产阶级；唯心主义者也不一定都是形而上学和资产阶级，但是，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把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统一起来。

鲁迅早期接受过进化论的影响，在自然观方面是唯物的，在社会历史观方面虽然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庸俗进化论有

本质的不同，但在存在和意识的关系上，鲁迅过多地强调思想意识的作用，过分夸大了文艺对改造社会的作用；在个人与群众的关系上，片面强调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忽视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因此鲁迅前期的社会历史观基本上仍然属于历史唯心主义的范畴。在政治思想方面，早期（“五四”以前）属于激进的民主主义，中期（“五四”到一九二七年）属于革命的民主主义，后期（一九二七年以后）属于共产主义。就阶级属性来说，前期思想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范畴，后期则属于无产阶级范畴，简言之，鲁迅的前后期思想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从朴素的唯物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从历史唯心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当然，这只是就其世界观的主要方面和政治立场而言的，还不能包括他的社会观、道德观、文艺观等其他方面的思想。

二、关于鲁迅的思想质变及其特点

鲁迅什么时候完成了他的思想转变是研究者争论的焦点。有主张“五四”时期完成的，有主张一九二五年或一九二七年完成的，有主张一九二八年甚至一九三〇年完成的。

关于鲁迅思想转变，的确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一般地说，鲁迅思想确有前后期之分，后期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看问题较少片面性。但是，鲁迅前后期思想又有其连贯性，不能机械地分界，更不能规定得太死，说成是某年某月某日。鲁迅说过，一个人的思想不是某一个早晨就起了变化，而是不断地发展的。事实上，一个人的思想质变也不象自然现象那样绝对，任何人“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之后，也总是有继承、有交叉、有发展的。鲁迅前期虽然没有掌握马克思

主义，由于他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中国社会历史有独特的认识，他分析问题总是十分深刻、入木三分，相当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象《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娜拉走后怎样》这样一些文章，即使放到后期，也并不比其他文章逊色。因此，把鲁迅前后期思想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既没有看到鲁迅思想的独特性，也没有看到他思想的连续性。当然，把鲁迅的思想转变尽量提前，认为“五四”时期的鲁迅就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也不符合实际。鲁迅思想发展的特点，与其说是快，毋宁说是慢。和同时代一些革命者相比较，他的思想转变显得较缓慢，除了他自己独特的生活道路之外，主要由于他对任何事物都要经过独立思考和实践的验证，不轻信口号而要看事实，这样，他的转变过程不仅较为漫长，而且也较为曲折，但转变之后就十分稳健扎实。

鲁迅早年批判中国的维新运动说过：“加以旧染既深，辄以习惯之目光观察一切，凡所然否，谬解为多，此所为呼维新既二十年而新声迄不起于中国也”（《摩罗诗力说》）。鲁迅深知中国封建传统的顽固性和排他性，对新事物是很难接受的，不是错误理解就是根本歪曲，许多变革现实的理想都失败了。辛亥革命的失败给他的刺激更大，他“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十月革命前，鲁迅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结果都以失望而告终。十月革命的胜利，他很受鼓舞，但由于缺乏具体的了解，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又遭到反对者肆意的歪曲，鲁迅一方面对共产主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又感到迷惑不解，特别是他认为“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

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而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他在“五四”时期写的几首新诗如《梦》、《他们的花园》等都流露出同样的心情。《梦》用“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象征各种变革现实的政治主张，都在标榜自己“看我真好颜色”，但事实证明它们不过是“黑如墨”、“墨一般黑”。《他们的花园》用“小娃子”“走出破大门”象征寻找真理的人们走出黑暗的旧中国，向邻家的花园里找来一朵“又白又光明”的百合花，象征新的主义和理想，可是带到家中，苍蝇却在花上拉了黑屎，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被当作“过激主义”横遭攻击和玷污的象征。鲁迅在《随感录四十三》中也说：“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这也说明鲁迅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后期他回溯这段历程时说：“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地相信无产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

鲁迅思想转变的缓慢，不但不是他的缺点，相反地恰是他的踏实可贵的特点。许寿裳说，鲁迅的思想方法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而是从具体的事实出发，在实现生活中得其结论。鲁迅自己也说：“我自己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的事实”（《致姚克》）。

鲁迅的思想转变主要“由于事实的教训”，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学习理论的重要性，而是强调理论一定要与实际相结合。鲁迅的思想转变，表面看来是慢一些，但却有坚实可靠的基础，他是在有了相当丰富的斗争经验之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他的丰富的阅历又有助于他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不象二、三十年代的某些青年，对中国的实际理解很肤浅，虽然转变得快，但常犯“左”倾幼稚病，很难做到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则不然，他一旦掌握了马列主义，运用起来就很娴熟。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把鲁迅世界观的转变尽量提前。有的研究者用意当然是好的，但这样做既不足于服人，也无助于“拔高”鲁迅。另外，我也不同意把鲁迅的思想转变尽量推迟，认为只有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前后，鲁迅才完成了他的世界观的转变。严格说来，使用“完成”一词也是不科学的。一个人的思想转变没有完成的时候，如果“完成”意味着止于至善，不再发展，不再倒退，也不会再犯错误，这本身就是违反辩证法的。鲁迅如果一九三六年不死，他的思想肯定是要发展的，直到逝世之前他还说“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他从不认为他的思想发展有完成的时候。如果“完成”指的是飞跃，那么一九二七年前后便“完成”了。没有必要说得太死，更无需烦琐地论证它“完成”于某月某日。我同意这样的观点，促使鲁迅思想发生质变的因素主要是现实的教育。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鲁迅

“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从血的事实中看清了社会上尖锐的阶级矛盾，认识到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真理。其次是马克思主义给鲁迅指明了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和斗争方向。关于阅读马列主义著作，有人认为是从一九二八年才开始的，主要根据鲁迅在《三闲集·序言》里的一段话：“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这段话是仅就文艺思想而言的，并不是说整个世界观的转变，更不意味着鲁迅从这时开始才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著作。事实上早在日本留学时期他就读过了，以后又逐渐增多，只不过他自觉地运用马列主义来分析中国实际问题是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事罢了。

三、鲁迅前后期思想的一贯性

鲁迅的思想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但又有其一贯的线索，这就是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为全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为人类的彻底解放，运用各种思想武器同封建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作韧性的战斗。

鲁迅的一生是为祖国而献身的一生，早在一九〇三年，他就写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这样的诗句，凝聚着他热爱祖国的无限深情；一九三一年，他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之后，又再度把这首诗书为条幅，这决不是偶然的。诚如许寿裳所说，他“三十余年来，刻苦奋斗以至于死，完全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牺牲，一息尚存，不容稍懈”（《我所认识的

鲁迅》)。鲁迅青年时期，曾经探索过种种救国方案，如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医学救国、文艺救国等，其目的都是为了救国救民。虽然他在探索过程中曾经有过苦闷、彷徨、犹疑、失望、颓唐、甚至虚无的成分，但是，他热爱祖国的信念从未动摇过的。据增田涉的回忆，鲁迅会见日本作家柳原白莲时，他“频频攻击中国的政治，白莲先生问他：‘那么，你是讨厌生在中国的吗？’他回答说：‘不！我认为生在中国比生在其他任何国家都好。’这时，我看到他的眼睛里湿润着泪水。”事实也正是如此，即使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鲁迅也不愿意离开祖国。他攻击中国的政治，攻击几千年来封建传统，攻击国民性的弱点，恰恰是他热爱祖国的表现，爱之深，才能恨之切。鲁迅后期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这正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的必由之路，作为一个思想家，他是带着爱国民主思想、人道主义思想、启蒙主义思想等前期思想的合理成分走向共产主义的，是带着几十年与封建势力战斗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而走向共产主义的，他并不抛弃它们，而是把这些思想和经验加以提炼，使之上升到共产主义的高度，既从属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又丰富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宝库。

反封建是鲁迅前后期一贯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最大特色。前期，他从西方启蒙思想家那里接过人道主义、进化论等思想武器同各种封建意识形态作顽强的斗争。后期，他站在共产主义者的高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对封建传统、奴化思想作了深刻的揭露和鞭挞。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延续了两千多年、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的社会，它比欧洲的封建社会要长十几个世纪，而

且，当欧洲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反封建斗争之后，中国仍然是一个“十全停滞”的封闭社会。这个事实规定了它一系列的特点，如中国统治者的极端残暴，在这个制度之上形成一整套严密的封建思想体系，牢牢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把人民推向愚昧、麻木、迟钝、冷漠、忍辱的深渊。鲁迅对中国社会具有深刻、敏锐的洞察力，他的独特发现之一是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吃人”的社会，“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致许寿裳》）。所以当《狂人日记》发表后，著名思想家吴虞便著文赞扬，说这篇作品提高了他的民主觉悟。“礼教吃人”并不是大多数人都能认识到的，鲁迅不仅发现并揭露了它的吃人本质，而且也揭露了它的残酷性、顽固性。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必然也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对封建制度的反抗便不能不与捍卫人的尊严和自由、要求人的个性得到合理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所谓人性尊严，也就是做人的价值和生存权利。鲁迅无论是前期和后期都不遗余力地向封建的兽道和霸道开火。他在《灯下漫笔》中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又说：“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鲁迅后期，对中国人在历史上的悲惨地位又有新的论述。在《病后杂谈之余》中说：“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一向是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役、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

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察，真教人觉得不象活在人间。”鲁迅后期的许多文章都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残忍：宫刑、剥皮，凌迟、灭族……这些惨象在中国历史上是太平常了，所以人们不以为奇，不以为非。在《偶成》一文中说道：“奴隶们受惯了‘酷刑’的教育，他只知道对人应该用酷刑。”“奴隶们受惯了猪狗的待遇，他只知道人们无异于猪狗。”

不把人当人，这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基本特点。等级制度是统治阶级扼杀人性维持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地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灯下漫笔》）。在等级观念的支配下，社会上一切事物都要以等级的高低来衡量，人完全失去了自身应有的价值。五四前夕，鲁迅形象地把中国社会比作“一间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五四以后他又说，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鲁迅从前期到后期，对反封建的长期性、艰巨性都有极清醒的估计。作为盘根错节的封建政权，要推翻它是不容易的，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三十年的浴血奋战，才取得了胜利；作为封建的意识形态，要肃清它的流毒就更困难了！在这方面，鲁迅对它的估计不但一点也不过分，而且对我们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以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教训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